

[文献编码]doi: 10.3969/j.issn.1004-6917.2015.06.024

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历史文化认同

雷信来¹, 郑明钧²

(1. 大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大理 671003; 2.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2)

摘要: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两个具有承续性的地方政权, 它们坚定地认同唐宋王朝的历史文化。其中, 历史认同是指南诏大理国对中原王朝形成的关于血缘、地理和治统观念的认可与接受; 文化认同是指它们对源于汉地的有关心理、制度和道统认识的赞同和悦纳。

关键词: 南诏大理国; 唐宋王朝; 历史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5)06-0119-05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秦汉以来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1], 滇云大地上的各民族和全国其他兄弟民族同根共祖, 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南诏大理国是我国西南地区几乎和唐宋并存的两个地方民族政权, 它们参与过当时全国的政治生活, 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南诏国在其存在的时限内, 绝大部分时间以藩属国身份臣服于唐王朝, 大理国则终其一朝执着地向宋王朝输诚纳忠, 甘愿奉宋王朝为正朔, 即使对于积贫积弱至仅存半壁江山的南宋朝亦始终如一。南诏大理国作为中国历史时期两个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 非但没有产生过冲出云贵高原问鼎中原的政治宏愿, 而是把和中原王朝在政治上结成一体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对于这一政治现象背后的缘故, 笔者认为, 秉持对中原王朝强烈的历史文化认同, 是南诏大理国甘做方国拱卫中央王朝的深刻缘由。

考察历史时期南诏大理国对以唐宋王朝为表征的中央王朝的历史文化认同, 至少有如下三方面

意义: 第一, 析探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 尤其是南诏大理国对唐宋中央王权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 不仅有助于深刻地认识与体会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而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作为唯一一个文明进程未曾中断的古国存续数千年的缘故, 同时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深厚的历史文化支撑。第二, 历史文化认同体现并能够增强国家凝聚力,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地方民族政权对中央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既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和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极强历史连续性的政治共同体, 研究唐宋时期地方民族政权对中央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 对于加强边疆民族和民族地区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 维护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是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的问题, 而历史文化认同研究是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因此, 开展南诏大理国对中央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研究工作, 有助于理清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的发展脉络及其演变规律, 为进一步巩固和推动我国多民族统一、安定、团结大局提供理论基

收稿日期: 2015-02-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MZ0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1YJC770021);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YB2012032); 云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12Z120)

作者简介: 雷信来(1976-), 男, 安徽霍邱人, 博士,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郑明钧(1973-), 男, 安徽霍邱人,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础和历史经验。

对于“历史文化认同”概念的理解,学术界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历史文化认同”由“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两部分内容构成。“历史认同,主要指关于血缘、地理、治统的联系与认识;而文化认同,主要指关于心理、制度、道统的影响与传承。这里说的‘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道统’主要指思想传承的连续性。”^[2]基于对历史文化认同包含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领域的认识,故透析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皇朝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将分别从这两个领域展开讨论。

一、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历史认同

(一) 血缘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血缘与政治存在密切关联。南诏大理国作为当时中央王权治下的组成部分,中原汉地关于血缘与政治之关系的认识也深深影响到南诏大理国统治阶层。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就是南诏大理国的最高统治者试图和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搭建起血缘联系。西周时中原以西各部族方国被称为西戎,商朝时则被称为羌或者氐羌。根据《山海经》和《国语》的记载,羌人先祖是炎帝之后四岳。四岳之后的一部分和九州之戎较早与黄帝族融合,由此成为华夏族的重要来源,另一部分称为羌人。氐人的先祖是炎帝之后灵禬。由此可知西戎与华夏族有同源关系。南诏大理国王室及境内主体民族是乌蛮和白蛮,它们由僰人演化而来,僰人属于氐羌系统的一支,先秦时期从湟水流域逐渐迁而来,对此《史记·西南夷列传》曰:“僰,羌之别种也。”也就是说,乌蛮和白蛮源于氐羌人,氐羌人的祖先是炎帝。乌蛮和白蛮从族源上可以溯源到炎帝,而炎帝和黄帝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南诏大理国王室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上古的炎帝那里,不仅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血缘认同意识,也清晰地表明他们对中华始祖的敬仰,同时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是同源共祖的。

(二) 地理观念

像《诗经》当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名句,都与时人的地缘政治观念相关。战国时期,人们假托夏禹之名提出“九州”观念,秦汉统一政局的出现促使这种地理观念愈加深入并具体化。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滇王降汉,西汉王朝于滇王故地设置益州郡。益州郡的设置标志着西南夷地区开始正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理版图,成为汉王朝治下的一部分。这一标志性事件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明确记载。此后数百年间,中原政权虽不断改朝易姓,但西南地区隶属于中华地理疆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南诏与唐朝之间在“天宝战争”前属于藩属国和宗主国之关系,在“天宝战争”后,南诏对唐“或叛或附,恍惚无常”,还曾一度称臣于吐蕃,但从总体上看,南诏并没有脱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值得一提的是,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有南诏王异牟寻封五岳四渎的事件。“异牟寻以点苍山为中岳,乌蒙乌龙为东岳,银生府蒙东山为南岳,又封安南州神石为南岳,越巂高黎贡山为西岳,嵩州雪山为北岳;封金沙江、澜沧江、黑惠江、怒江为四渎,各建神庙。”^[3]五岳在中国历史上是富有政治文化内涵的地理观念。“这些山川以其显赫的景观形象,均衡的地理布局,逐渐成为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国土象征与地理框架。”“而在考虑岳的分布时,又以都城与岳的关系最为重要,就是说五岳的分布应当与都城有一个协调关系,理想的情况是都城在中央,靠近中岳。”^[4]根据这一原则分析异牟寻分封五岳的举动,尤其是把靠近南诏都城的点苍山封为中岳,可以发现这完全是中原王朝封授五岳的翻版。由此可见,中央王朝关于封祀名山巨川的政治举措,作为中原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为南诏统治者所继承和认同。宋时,大理不但从未和宋朝发生过战争,而且从始至终一直向赵宋王朝输忠纳诚,意欲融入以宋王朝为代表的中华地域版图。大理国“在边疆与内地一体问题的认识上比南诏还进了一步”^[5]。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地理观念的认同,是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历史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治统观念

如上所述,“治统”是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它上起三皇五帝,下至唐宋元明清,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的连续性观念。对于历史时期的治统观念,南诏大理国统治阶层持完全认同之态度。南诏大理国是和唐宋朝并存的地方民族政权,因此,南诏大理国对中华治统观念的认同,就表现为对居于治统链条重要环节的唐宋皇朝的国家认同。这里所说的“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

【历史研究】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历史文化认同

是相当于“王朝”概念,“国家认同就是人们对国家政权的态度与情感,指对国家政权的认可、选择和自愿将自己同化于国家这个集体中的心理活动”^[6]。南诏由一个酋邦发展为地域辽阔、实力颇强的地方民族政权,在此过程中离不开唐朝的支持,而唐朝扶持南诏的前提是南诏先于其他五诏与唐朝建立起紧密的政治关系,奉唐朝为理所当然的宗主国。于是在738年,唐玄宗遣使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唐玄宗统治后期沉迷享受而荒怠朝政,加上用人不当,以及治边之策出现严重失误,致使唐南诏“天宝战争”的发生,把南诏推送进吐蕃的怀抱。在南诏被迫暂时臣服于吐蕃王朝期间,南诏仍然思慕唐朝,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归化大唐。这一点在776年南诏立于国门的德化碑上有清晰表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至此,可指碑澡洗吾罪也。”(《新唐书·南诏上》)以此为铺垫,才有794年唐南诏间的“点苍会盟”,南诏重新归附大唐。此后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发展虽不平顺,但南诏大体上还是持守着自己藩属国的地位,即使是世隆在请封遭拒的情境下僭越称帝期间,还一再表示希望恢复与唐的臣属关系。事实上,世隆虽僭称皇帝,但未改唐正朔,这从侧面印证出南诏仍服从唐王朝的一统局面。

相较于南诏对唐朝的国家认同,大理对宋朝的国家认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建于960年,亡于1279年,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前后共历320年。宋朝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皇朝,尤其南宋仅存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在以往许多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7]姑且不论此说是否成立,但在中国治统序列上,宋朝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在异族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则是不争的事实。北宋政权建立不久,大理就遣使祝贺,希冀与宋朝通好。通过大理政权的不断努力,982年,大理政权搭建起向宋朝进献方物的朝贡关系,见于记载的朝贡有多次。大理国对于与宋皇朝政治关系的期望值远高于这种朝贡关系,于是在维持与宋朝朝贡关系的条件下,多次派遣使节,要求宋王朝对其进行册封。这种政治请封却被北宋朝一再冷落,但大理国矢志不渝,直到宋徽宗时,这种政治诉求才得以实现。宋室南渡偏安一隅后,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偏见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君臣对大理政权的戒心有增无减。”“在南宋看来,大渡河以南的地区已属徼

外。”^[8]南宋出于民族偏见刻意疏远与大理国的关系,但大理国仍视南宋为当然的宗主国,并在外族入侵时忠诚地履行作为藩属国的义务。1244年蒙古军队攻入大理国辖境,大理国派遣高禾迎战,此役高禾战死,蒙古军队也退去。此时的南宋朝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完全倾覆只是时间问题,而大理国非但没有背叛南宋,反而在忠实践履作为一个方国拱卫中央政权之职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理解为大理国对宋王朝深沉的国家认同使然。

说到“治统”问题,还有个与此极度相关的概念,即“正统”问题,这需要提出来讨论一下。“‘正统’问题之争,说到底,是政权是否具有法统地位的争议,而是否具有法统,则是以该政权是否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统绪中占据合法地位的问题。”^[9]有宋一朝,北方和西部先后立国的有辽国、西夏国、金国,以及后来的元朝等政权,先后与之对垒共存。

“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而宋则称它们为北朝,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分裂的时期。元朝人在编写前代历史时,《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并列,这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境内的实际情况。”^[10]《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均被视为正史处于并列地位,意味着在元朝史家眼里,宋、辽、金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统绪中都处于正统地位。这是元人对此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而大理国对此问题则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措置。北宋时期,大理国只认可北宋朝为正统,不遗余力地追求与北宋朝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关系,而把辽、金视为地方政权,与之基本没有什么政治关联。南宋时期,大理国仍视南宋为正统的中央王朝,即使南宋偏安东南一隅苟延残喘,势力强大的金、元在大理国眼中只是地方割据政权。这明白无误地表示,大理国只认同赵宋王朝在中华治统序列的正统地位,先后在宋王朝周边崛起的民族政权则处于非正统地位。

二、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文化认同

以上所论是唐宋时期,以乌蛮和白蛮为主体的南诏大理国政权对于中华历史的认同,对于中华文化,他们同样表现出炽热的认同。南诏大理国对于中原王朝的文化认同,由表及里体现在心理、制度和道统三个层面。

(一) 心理认同

心理认同指的是南诏大理国在心理上对中华文

化的学习、理解和仰慕。南诏大理国对于唐宋王朝的心理认同,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1.从文化发展成熟程度看,尽管南诏大理国地处“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之位置,四方商贸往来很频繁,接触到的文化因子亦颇多,但南诏大理国深知其文化昌明程度远不及同时期的唐宋王朝。这是南诏大理国积极学习中原文化的客观原因。

2.大量购买中原的历史文化典籍,作为学习之资。这方面的事例颇多,比如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国王段正淳派遣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69家,药书62部。“但不论官方或民间的至广西与宋交易者仍络绎不绝,其所购买中有的以书籍为主。”^[11]

3.王室以饱学儒士为师学习汉文化,贵族子弟长期到中原地区就学。郑回原是南诏俘获的汉人官吏,因其有才学,被阁罗凤任命为王者师,在异牟寻时期更被委任为位高权重的清平官之职,他不仅协助异牟寻进行政治改革,还为南诏重归唐朝立下不朽历史功勋。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成都设立专门招收南诏子弟的学校,系统向他们传授汉文化长达50年之久。

4.通过商贸渠道间接学习汉文化。南诏大理国和唐宋王朝始终存在着商贸联系,有时还很频繁,即使双方的政治关系处于比较冷淡时期,双方的商贸往来,包括官方和民间两者渠道,一直未曾中断。商贸交流伴生着文化的传播,这是古往今来商贸交流中常见的现象。大理国就曾通过商贸交流渠道多次向宋求取大量书籍,说明随着大理国文化阶层汉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他们对中原历史文化典籍的需求越来越多。

(二) 制度认同

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诏大理国对中原王朝主体民族的制度认同意识,展示得很明晰。具体地说,就是南诏大理国对中原王朝政治制度及其设施的学习、模仿和借鉴。《南诏德化碑》开篇即曰:“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又曰:“列尊叙卑,位分九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等级秩序是中央集权专制社会最显著的政治特征。南诏国深谙此道,这也是南诏国于立国之后确立专制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唐朝中央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在都

督府或州有功、仓、户、兵、法、士六曹^[12]。南诏在综合唐朝中央六部和内地府州的组织形式和职能基础上,也有六曹之设置。“在南诏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原唐朝所起的示范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南诏节度、都督的建置基本沿袭唐朝制度而有所增损。”“有的节度区内州、郡并立的情况,也是南诏受唐朝州郡反复改用结果的影响。”^[13]南诏基于自身实然的政治社会状况,对中原的政治制度进行移植和吸收,使南诏国的政治制度呈现出很高的仿唐性。另外,南诏也曾效学中原与唐廷进行和亲。这次和亲从提出到唐僖宗答应嫁安化公主给南诏王,时间持续达6年之久。南诏王之所以愿意和唐朝和亲,也是看到战争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破坏,同时导致国库空虚,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故欲以和亲之法缓解其内部矛盾,借以维持其统治的延续。唐南之间的这场和亲,无论是从哪一方来看,联姻的功能和性质与汉匈和亲一样,属于典型的安边型政治和亲^[14]。由此不难发现,南诏王世隆、隆舜父子对于中原王朝在处置与少数民族关系时使用的和亲方略是颇为知晓的,并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灵活运用之。

如同“汉承秦制”一样,大理政权基本上是继承南诏政权而来,其前期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可视为南诏政治制度在大理的延续。因南诏国政治制度具有很高的仿唐性,因此说大理国前期的政治制度具有高度的汉地色彩当不为过。在具体制度方面,大理国仿效中原王朝,实行开科取士制度。“段氏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南诏野史·大理总管段实传》)倪蜕的《滇云历年传》也称:“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段素英敕述《传灯录》,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大理国后期依据经济状况和地区特点在府、州之下又设置郡、县两级行政区划,这种类似于宋朝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可以看成是对宋王朝政区划分的模仿。

(三) 道统认同

道统本质上指的是“儒家理想中的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包括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士人的立身行事的准则,以及与之相应社会伦理和处事方法等。”“这些思想传统内容大都蕴涵在儒家的经书之中,是中国古代思想或精神文化的体现,是否认同这些思想文化所体现的价值,是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要面临的文化抉择。”^[15]自汉武帝在云南设治

【历史研究】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历史文化认同

始,中原王朝借助册封、朝贡、和亲、通好等方式,在愈益强化滇云大地与祖国内地政治联系的同时,持续向云南少数民族传布儒学思想。汉晋年间云南已有郡县之学,当地也有人向司马相如学习儒家经典。唐代,一批接着一批官贵子弟到成都学习儒家文化,少数优秀者还有机会到唐都长安就学。宋代,大理国通过家庭教育和以寺庙为平台,培养了不少既懂佛又通儒的“释儒”和“儒释”,并借由开科取士之途径选拔其中俊杰为官吏。崇儒重道以行教化,是儒学重要的政治功能。自汉晋迄唐宋儒学思想在滇云大地的流布和浸染,对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南诏大理国不仅认同中华道统观念,反而能把对道统观念的认同付诸践履。首先,是对儒家大一统之尊君观念的尊奉。通过研读相关史料,可以发现南诏王室对唐朝君主的政治忠诚。“遂与清平官大军将大首领等密图大计,诚矢天地,发于祯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愿归清化,誓为汉臣。”(《蛮书》附录一)大理国非但没有侵略过宋土,反而“向慕中国,志不少衰”(《滇云历年传》卷五)。其次,借助神话来论证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据唐人樊绰的《蛮书》记载,南诏王室在贞元年间曾“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录来看,这本是早在汉晋时期已经在哀牢山区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关于龙的神话传说。所谓“本永昌沙壹之源”是说南诏王室的先祖是龙,他们是天所贵者,故有理由担任南诏王。大理段氏同样如法炮制,宣扬开国主段思平是受命于天的龙子龙孙,标榜段思平掌权是天命所授。最后,效法中原,给国王加谥号或庙号。南诏第五代王阁罗凤谥号神武王,第六代王异牟寻谥号孝恒王,第七代王寻阁劝谥号孝惠王,等等。大理国王自称皇帝,亦拥有谥号或庙号。大理国前期的国王重谥号的倾向很明显,后期的国王因高氏专权王权旁落而尤重庙号,“以此表示大理国王权的正统性与连续性”^[16]。大理传国23代,前十位王只有谥号,没有庙号,后13位国王中有12位王有谥号,其中6位国王有庙号。第四,南诏王丰佑不肯连父名。南诏第十代王劝丰祐系劝利晟之子,按照南诏父子连名制的祖制,应该叫晟丰祐,但他“慕中国义,不肯连父名”,把名字改为劝丰祐,以示对中原儒家礼义文明的向往和雅好。第五,大理国名及国王的名称和年号。据考证,

“大理”之名来自“大礼”,“礼”和“理”均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南诏王世隆改国号为‘大礼’,旨在效法中原,奉行礼治。段思平得国,在沿用‘大礼’旧称的基础上,改‘礼’字为‘理’字,将国号定名为‘大理’,其用意也在于要重礼乐、贵理义,把统治的地区治理得和中土一样。”^[17]除此而外,大理国还在其国王的人名和年号的使用上向儒学靠拢,以表示他们效学汉儒以礼治国的诉求,如大理国开国主名“思平”,有修齐治平之宏愿,其年号“文德”含文教德化之意。

参考文献:

- [1]瞿林东.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传统[J].河北学刊,2005,(3):71.
- [2]瞿林东.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一卷(代序)[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1-2.
- [3]李维绪.白族文学史略[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56.
- [4][9][15]瞿林东.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34;2;44.
- [5][8]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358;8.
- [6]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44.
- [7][10]葛剑雄,徐洪兴,姚荣涛.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大宋王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 [11]木芹,木霁弘.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32.
- [12]刘昫.旧唐书·职官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3]谷跃娟.南诏史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74.
- [14]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
- [16]段玉明.大理国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118.
- [17]龚友德.白族哲学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102.

责任编辑:黎伟盛